

美术馆的历史

HISTORY OF ART MUSEUMS IN CHINA

中国近现代美术馆发展之研究

1840—1949

李万万 著



李万万, 祖籍安徽, 1982 年生于河南济源。2005 年 6 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进入中国美术馆学术部。2011 年 9 月, 调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策划与管理中心, 负责展览策划工作。现主要从事 20 世纪中国美术研究、艺术博物馆学研究及展览策划。在中央美术学院为研究生讲授美术博物馆学等相关课程。曾获中央美术学院优秀毕业创作奖、张安治教授美术史论奖学金、南开大学“王玉哲文博基金”最高奖、北京文联第六届文艺评论二等奖等。

编辑出版著作 10 余种, 发表专业论文 60 余篇, 主持策划 10 余项国家重大展览项目。作为核心成员, 负责重要课题及研究出版项目: 2005 年度国家重点课题《20 世纪中国美术作品的国家收藏研究》(学术秘书)、2008 年文化部项目《周恩来与中国美术》(执行主编)、2009 年文化部重大项目《新中国美术 60 年》(项目负责)、2009 年文化部项目《Shanghai Modern——中国近现代文化专题研究》(项目负责)、2010 年北京文联重大项目《新中国北京美术 60 年》(副主编)、2010 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红旗飘飘——20 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专题负责, 撰稿人)、2012 年国博研究项目《中国百年雕塑》(执行主编)、2012 年国博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国家博物馆简史》(专题负责, 撰稿人)、2013 年中国美术馆重大学术出版项目《郁风艺术评传》(项目负责, 撰稿人)、2014 年《刘开渠艺术研究》(主编, 撰稿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展览研究》(项目负责)、“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及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美术馆的历史》(项目负责)、北京市文联重大项目《新时期北京美术志》(执行主编)等。2010 年在《团结报》开设《中国宣传画》及《中国年画》专栏, 发表 13 篇论文; 2012 年、2014 年在《中国美术馆》杂志开设《艺术博物馆学》和《中国现代雕塑研究》专栏, 发表 18 篇专题论文; 2015 年 10 月起, 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天地》杂志开设《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展览研究》专栏, 连载 12 篇学术论文。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一个年轻学者的担当

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美术馆，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建造的热潮和观众的需求。由于它是以收藏、研究、推广代表文化结晶的美术作品为宗旨，而归属于庞大的博物馆体系中的一个门类。研究美术馆自身的规律、本体特质、专业化职能，涉及美术创作、美术作品及相关的文献收藏、保管维护、美术普及教育、美术评论、鉴定、研究、推广等等方面，既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鲜明的时代性，又有涉猎多学科的综合性。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涌现出各种新问题、新挑战，显现许多日新月异状况和创新，总结美术馆成长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曲折，追求规律性的探讨和理论升华。故而在国际学术界、美术馆界形成一种美术馆学科。这样的学科研究和交流，对世界美术馆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中国的美术馆事业方兴未艾。百年以来在步履蹒跚之中，也有许多史料可以挖掘。在美术馆学的研究方面，虽然还比较单薄，但有一些学者和美术馆人并不气馁，在不断地做着努力。其中青年学者李万万不怕坐冷板凳，写出《美术馆的历史》专著。我被他这种文化自觉和开拓精神，艰辛难能的可贵跋涉，引起了倾心 and 震动，作为一个美术馆老人的热忱油然而生。我支持他继续深入地把这门学问做下去。

在西方世界的博物馆业兴盛之初，涵盖着科学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门类。美术馆在其中就以博物馆性质确立。随着西方产业革命带来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社会变革，美术馆在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潮影响下，经过将近两个多世纪的茁壮

成长,为全民公共服务的、非营利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形成,这一条就成为美术馆的根本特性和定律。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的文化生活中和艺术体系里,美术馆必不可缺,已经不仅仅是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摄影传媒等等视觉艺术的展览场所了。真正的国际化的美术馆即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国家形象与民族精神的象征,艺术珍品与历史文献的宝库;供人们欣赏、研究艺术大师的作品,进而得到美的熏陶、美的启示,从灵魂深处受到美的净化;不仅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而且推举新的艺术人才;同时传播时代艺术精华,并引领民众树立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敬畏意识;教育和启蒙民众,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杰出的教育家,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在考察了德国的哲学、艺术、文化史之后,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这一理论,并表明“美术馆”要把人类的精神财富公之于众。为了践行“以美育代宗教”,他力主在中国建立美术馆。

与蔡元培同时的鲁迅也指出“播布美术之方”,明确提出建立美术馆:“当就政府所在地,立中央美术馆。”徐悲鸿在欧洲期间,就多次建议国内创建美术馆,他曾说:“国家唯一奖励美术之道,乃在设立美术馆。”他还说:“真能帮助艺术进步的,莫过于美术馆了。任何文明国都市,都有美术馆的设立,所以陈列古今美术品,亦用以鼓励新近作家。各国用以考验人民文化程度,此亦为其一端……美术馆为劳动者恢复疲劳,儿童之启发智慧,以及慰藉休息时间稀少者,其功用之发挥,较图书馆为尤大。美术馆尤其是艺术天才的归宿地……”徐悲鸿疾呼:“然则何不急办一美术馆?”

在中国,美术作品及其他艺术品的收藏古已有之。但是在封建社会,美术品、古代艺术品、工艺品多归帝王权贵秘藏。自五四运动以后,康有为、蔡元培、鲁迅、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等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建立美术馆的呼声从未停息。而且设计思想,呈报建议,撰写宗旨纲要,均有务实的谋划与方案。学界在千呼万唤中,民国政府于1936年在南京建立国立美术陈列馆,不幸仅存一年,日寇入侵,南京失陷,该馆就此关闭。

李万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美术馆的历史》一书中详细地记述了中国的美术馆史与理念。资料翔实,客观地进行分析,论述清晰,还原历史的真实,观点明确,将近代发达国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全面翔实地呈现出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美术馆发展历程。从数百万字的原始资料中,通过严谨的思考和精心的筛选,提纲挈领地描摹出美术馆的发展线索,以及当时的美术展览体制和相关的美术现象与状况。耐人寻味的是,数十年的文化先行者为中国的美术馆事业不辞劳苦地推进,命运多舛,事倍功半。作者从他们的实践中认识到美术馆学的重要意义和令人敬畏的人文价值,撰写成书,体现了这些史实为今后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勃兴带来重要的奠

基意义和启示。

作者写道：“美术馆与中国近代社会的邂逅，于它初遇那个颠簸的时代而言，尤其是和政权更迭、战火硝烟的种种状况相比，实在算不上一桩动人心魄的大事；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与美术馆的邂逅，于他们渴求拯救万民之道的心理而言，却好似在开启民智的艰难途中高高矗立起了一座华美的理想丰碑。”此语铿锵有声，令人动容。

作者正视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政府的腐朽，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日寇侵略，战乱频繁……在如此的状况下，为美术馆事业奋斗的先哲们充满着爱国热情与执著的信念，奔走呼号，忧国忧民，期望借鉴西方美术馆的理念，救国安民。他们在欧洲亲历了各国的美术馆的壮观和水平，认识到美术馆的功能和艺术作品改变国民素质的作用，看到了美术馆的重要性，他们深刻了解了美术馆的内在本质，也感悟到欧洲美术馆的发展较为成熟，怀抱理想与激情。然而他们生不逢时，美好的抱负得不到施展，李万万为他们感到心酸与伤感。但是他以钦慕而正义的眼光赞颂那些先哲们“高高矗立起了一座华美的理想丰碑”，为后辈的美术馆人接力奋斗树立了宏伟远大的目标。足见作者的洞察力和良知，以及他撰写《美术馆的历史》为唤起今人文化觉醒的刻骨铭心。我想这正是该书发人深省的内涵力量之价值所在。

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影响，在中国掀起创建现代意义美术馆的热潮，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开始了对社会的美术普及、美术展览，着手美术教育、开办学校，在京津江浙等地同时兴起。美术馆以收藏展示美术作品为己任，必须积累丰殷的时代艺术精品作支撑。美术创作的繁荣和大量人才的涌现，推动着美术馆的壮大。正因为如此，徐悲鸿才把美术馆的存在称为艺术天才的归宿地。所以那些从国外回来的美术前辈们几乎都在专业创作的同时，从事美术教育事业，从事社会美术活动的策划，纷纷向官方政府上书，并做政策性的谋划，规章制度的拟订，社团组织的撮合，活动经费的征集……《美术馆的历史》一书中，对上述内容的相关史料详尽的分析，显然作者十分清楚美术馆的命运与其他不可分割的方方面面，有着紧密的互动影响和联系。作者对老一辈学者追逐的美术馆基本框架与相关活动有所肯定，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态中造型艺术主张的陈述，但是学术纷争、教育成果出现的艺术作品和流派并没有占据什么篇幅，站在美术馆史的角度，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美术馆建设大多是纸上谈兵，现代意义上的美术馆并不具规模。因此，这一本史书要比纯粹的美术馆史内容丰富了许多，其资料的旁征博引体现出作者立体的史学观，使人们对美术馆发展的关键外力和必然内因，将会有个全面认识而一目了然。

注重实践的博物馆、美术馆研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和学术层面，将美术馆置于整个社会的背景下考察，关注它的历史、基本哲学，在不同国家建立发展美术馆的各种模式，目标与政策及教育、政治、社会多方面的功能效应和未来发展的设想，国际的美术

馆和中国(包括港澳台)的美术馆经验,已经逐渐形成了美术博物馆的专门学科。李万万所著《美术馆的历史》,全书共分七个章节。其中历史资料、参考文献、大事年表,以及丰富的图片配合,层次分明,可读性很强,无疑为美术馆学增加了可喜的成果和突破。我相信这对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

美术馆成长过程的挫折和教训,为其以后的发展找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书也不失为一面历史的镜子。《美术馆的历史》将会对中国的美术馆事业发展和专业水平的不断提高,起到推动与导引的作用。我希望本书能够让广大读者、美术馆建设的从业者、史论研究者,特别是文化管理部门的决策者们,引起共鸣,使它的出版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

在文博系统和美术界,学者李万万可谓后起之秀。他和美术界的许多同仁一样,为中国的美术馆在建设中的复杂性、曲折性而深感任重道远。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美术馆史,香港、澳门、台湾的美术馆史,也有待撰写。为中国美术馆事业走向真正的繁荣新阶段,我深信学者李万万会为这一宏大主题而奋斗不息!作为新的更大贡献,用实际行动担当这样的重任。

杨力舟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
中国美术馆第二任馆长
2016年1月

筑梦中国美术馆事业

在从事多年的文化事业管理工作中，特别是在中国美术馆馆长任内，每一次出访，都会让我在参观一些国家以完整、系统的固定陈列展现其国家的文明发展和整体形象后，发出由衷的感慨。我梦想实现这样的宏图：让每一个来到中国北京的海内外嘉宾，都能在我们的美术馆、博物馆等国家公共文化殿堂中，看到完整、系统的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华文明美术史。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热潮中，这一早已酝酿在我和广大艺术家心中的美术中国梦也将成为中国梦内涵中重要的视觉内容。

为了实现这一美术中国梦，在跨入 21 世纪以来，在中宣部、财政部和文化部、中国文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策划并推动“20 世纪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主旋律美术创作，旨在创作一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能系统全面地展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和奋斗历史的美术作品。五年前，“20 世纪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已圆满完成，收藏在中国美术馆。而入选“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在进行正稿创作，完成后的全部作品将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回想起 20 世纪，中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现代共和国家体制，在中华民国建国之初，第一任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就把美术馆、博物馆建设的文化意义，提到教育国民、淳风化俗的高度。蔡元培在谈到他考察欧洲时说道：“我向来旅行很注意三点：第一是看一种不同的自然美；第二是研究古代的建筑；第三是注意博物院的美术品。”蔡元培说：“有美术博物馆，陈列各时代各民族的美术品，如雕刻、图画、工艺、美术以

及建筑的断片等，不但可以供美术家的参考，并可提起普通人优美高尚的兴趣。”

梳理 20 世纪中国美术馆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撰写一部美术中国梦的筑梦史、几代美术馆事业传人的奋斗史。李万万是一位勤奋肯钻研的年轻学者，在我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期间，他刚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进入到中国美术馆学术部工作。多年以来，他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深入钻研，第一次系统梳理和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馆的历史，明确而清晰地呈现出美术馆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美术馆的历史》是一部填补中国美术馆学空白的经典著作。我为这位青年学者的成就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祝贺他，同时也祝愿李万万再接再厉，多出成果！



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
中国美术馆第三任馆长
2016 年 1 月

中国美术馆学的基础性研究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美术馆曾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美术创作、美术理论等领域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美术创作特别是美术理论也对美术馆事业的成熟有着积极的作用,这种关系是互动的。显然,美术馆学虽然立足于美术馆,但其学术触角却牵连着人文艺术学科的广阔领域。关于美术馆历史的思考,是美术馆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1793年7月27日,法国国民议会宣布,卢浮宫将于8月10日作为公共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以纪念旧制度消灭一周年。从这一天起,现代意义的公共艺术博物馆正式出现,虽然它并非世界上第一所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博物馆,但所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之前的皇家宫殿经过重新整修后免费开放,这象征着旧制度的灭亡和新秩序的建立,艺术品由旧王朝的奢侈品及特权阶层的享受品变为国家财产,成为激发爱国热情和启蒙大众的重要资源。这种艺术博物馆的发展模式从法国延伸到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后来跨越大西洋而影响美国,最终再蔓延至全世界。艺术博物馆和美术馆不仅仅用于保存和展示那些为世人熟知的艺术大师的作品,供人们欣赏、研究之用,同时也成为社会步入现代形态,体现公共文化生活的标志。

而在中国,艺术作品的收藏古已有之,如《周礼》中就曾记载:“天府掌祖庙之珍藏”,“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在观文殿后建立二台,“东曰妙楷台,藏自古法书。西曰宝迹台,收自古

名画”。这些多是皇室收藏。此外，贵族、士大夫、学者、商人往往也在财力充裕的情况下私人购募古玩珍好，以作收藏鉴赏之用，如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搜救金石20年，所藏钟鼎宝器、书法、绘画、图书典籍等就装满10余间房屋。此后，倪瓒、阮元、孙星衍、缪荃孙、陈介祺等也均有重要的艺术作品收藏。在某种程度上，“藏富于民”就包括了艺术的民间收藏，而与之并行的皇家收藏则日益成为定制，自北宋而晚清，久盛不衰，攒聚了无数杰作经典。但封建时代的艺术品多为皇家和私人所有，并不公开展示。直至19世纪下半叶，一批文化先哲前往欧洲踏访考察，发现了博物馆的社会功用，博物馆意识才在中国萌发。随着蔡元培、鲁迅、徐悲鸿、严智开、林凤眠、颜文樑等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极力呼吁，中国社会才开始慢慢了解和认识了博物馆和美术馆的价值。

近代美术展览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刺激了对专业美术馆的需求：一方面因为展场的缺乏，凸显出建设固定美术展览机构的必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对美术展览认识的加深，国人逐渐意识到美术展览所存在的临时性、短暂性和局部性的问题。建设美术馆、创立长期陈列，才是展示美术作品、推广审美教育的长久之计。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呼吁和不懈努力下，中国的美术馆创建才终成现实。民国时期，开始在地方建立专业的美术馆，尽管有些规模很小，但其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馆事业的开端，却具有首开风气的作用。而当时的一些地方美术馆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设施和组织管理制度，体现出中国近现代美术馆的滥觞。

中国最早的现代私立美术馆，是由颜文樑等人于1927年筹备并建立的苏州美术馆，它结束了苏州画赛会“会场历届无定址”的历史，解决了当时苏州美术展览场地的窘迫问题。此后，苏州美术馆又继续扩建，既有适宜展出中国传统绘画的园林式风格，又有融汇现代特色的西式展厅，是沪浙地区重要的艺术展览场所。1930年，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立美术馆——天津市立美术馆，严智开被委任为第一任馆长。天津市立美术馆设立之初，严智开专门去东京考察以便“采彼邦之组织，参吾国之情势”，直接借鉴日本及西方美术馆的管理经验，使天津市立美术馆自起步就与当时国际业界通行的做法接轨，标志着中国现代公立美术馆事业的开端。在地方美术馆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之后，国立美术馆的建设也开始提上日程。1935年，经于右任等提议在南京建立国立美术陈列馆。1936年8月，国立美术陈列馆建成竣工，这是中国第一座国家美术馆。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美术馆运动曾一度中落，但其理想却从未中断：美术展览在战时的中国依然可见，并由于唤起民众、宣传救亡与御敌而被推广到街头和乡村。战时重庆国立中央美术馆和战后上海市立美术馆的筹建，也显示出当时中国文化界对美术馆的艰难追求。而解放区的美术活动和革命文艺思潮的涌发，为中国美术指引了新的发展方向，也为新中国的美术馆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恢复,美术馆建设成为文化建设的一环。1956年,江苏省美术陈列馆和上海市美术展览馆相继成立。1962年,中国美术馆在北京市中心落成,成为中国美术馆界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馆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各地公立美术馆相继建立,民营美术馆方兴未艾,共同形成新的公共文化景观,为此,人们用“美术馆的时代”来指称美术馆在艺术创作与社会接受、艺术保存与公共教育、艺术展示与传播推广方面的综合价值。

美术馆的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既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全球美术馆的快速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今日世界,美术馆已经成为彰显国家文化形象的象征。来势迅猛的美术馆建设热潮与公众的审美文化需求,向美术馆的学术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与世界上第一批美术馆专业人士——卢浮宫的工作人员相比,今天的美术馆从业者所要面对、解决的问题和挑战无论在数量和难度方面都已经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二战以来,西方大国的美术馆在内容、数量、功能、角色、社会地位等方面不断呈现出新的特色,美术馆的评价标准也与最初有了迥然不同的体系,这些问题而今也摆在在中国的美术馆面前。当代的美术馆已经成为一个涉及美术创作、美术收藏、美术普及与教育、美术评论与研究,甚至是美术产品的宣传与推介等多方面功能的综合性机构,这与最初的美术馆工作仅仅专注于保存和展示美术作品等实际操作手段不同,二者在所从事的具体事项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这导致了美术馆观念面临历史上的巨大变迁。

美术馆与博物馆在历史上密不可分,在博物馆学不断探讨和完善的过程中,作为与博物馆发展相关的美术馆也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不断地审视并调整着自身的功能、角色与责任。可以说,美术馆从萌芽至今,在它成长中所迈出的每一步,都凝结了博物馆学研究成果的心血。美术馆的建设管理与博物馆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前,学术界一直致力于博物馆学的定义、概念和范畴的再研究,力图重新审视博物馆的性质、职能及其在实际运营中所呈现出的发展变化对博物馆学进行新的理论阐述。博物馆学的各种分支学科建设也在展开,如博物馆管理学、藏品保管学、博物馆教育学、博物馆陈列学等已经被纳入了博物馆学的研究体系之中。此外,“生态博物馆学”等新的概念也被提出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伴随着这些新问题的提出和思考,博物馆学对于博物馆的指导意义将会更加明显。在如此背景之下,对于美术馆而言,这无疑也是学术探研的大好东风。

美术馆在历史上与博物馆有着很深的渊源,因此对美术馆学的建构可以借鉴博物馆学研究的相关成果,这对于美术馆学科的发展是一种便捷而有效的途径。然而,中国的美术馆在内容、功能、角色等方面的定位决定了它与一般的综合性博物馆以及其他专业博物馆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因此,立足于美术馆自身,而不是从博物馆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来观照美术馆的发展与建设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而迫切。美术馆事业

的日新月异,必然要求其在实践方面的发展之外,理论方面也应该有所突破。美术馆学的建立就成为一个亟需提上日程的学术任务。美术馆学的研究与博物馆学一样,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学科互渗性,这既由其自身性质所决定,同时也与“美术馆”这个研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相关,应该将美术馆制度建立的背景、美术馆与国家文化认同、美术馆与人类生活方式等问题纳入到研究视野,应该建立起中国的美术馆学。

虽然自20世纪初以来,就有不少文化界人士和美术馆从业者就美术馆的功用、建筑设计、组织机构、藏品征集、作品保存与展陈制度、美术馆的教育职能、出版宣传制度等进行过一系列的论述,但这些成果还远不能被称为专业的美术馆学,因为其并未站在一个学科的高度对美术馆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纵观当今美术馆领域的研究成果,其更多侧重于对“开来”工作的探讨,对“继往”方面如美术馆历史的梳理还极为不足。实际上,中国的美术馆何时、何处、以怎样的方式走来?美术馆身影又曾经在哪里出现?它承担着怎样的历史使命,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历史上美术馆的思想、制度和文化背景如何,其对当时中国的美术馆建设又有着怎样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是研究中国美术馆学领域所必须面对的。

中国近代以来美术馆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复杂性,其在理想与实践方面的诸多努力,奠定了新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基石。因此,详细梳理近代以来中国的美术馆发展史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对于中国美术馆学的领域是一项基础性工程。青年学者李万万通过自己十几年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并不断地进行深入思考和论证,最终形成了《美术馆的历史》这本专著。通览全书,作者将中国的美术馆发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纳入近代以来的文化图景,从宏观的角度论述美术馆在中国的前世今生,更从美术馆这个本体角度钩沉发微,搜集了大量文献史实与图像资料,全面而清晰地呈现中国近现代美术馆的发展历程,从专业的视角来诠释“中国近现代美术馆的历史”这一宏大主题,弥补了美术馆历史研究的缺憾,填补了中国美术馆学的空白。我相信,这一著作的面世,对于中国美术馆的研究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建构起中国的美术馆学提供最富基础性意义的价值。

范迪安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美术馆第四任馆长
2016年1月

建立中国的美术馆学

作为一个和万千同仁一样,准备为中国的美术馆事业贡献力量、付出满腔热情和心血的美术馆人,此时此刻我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世界不缺少美术馆,美术馆数量的激增是一种全球现象;今天的中国也不缺少美术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正在进入美术馆的时代。

按照目前标准,现代意义的美术馆在人类社会中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自从艺术逐渐挣脱宗教和政治的重重束缚,美术馆就开始成为艺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它收藏、保存、展览和研究视觉艺术;向公众展示绘画、雕塑、设计、建筑等各种以物质材料为媒介、在空间中呈现的视觉艺术;除了教育、启蒙普通民众,近现代以来的美术馆还部分地担负了发现、扶持艺术人才的社会责任;越趋当代社会,美术馆越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比如充当一种集休闲、娱乐、交流等社会功能于一身的公共空间。美术馆的扩张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同步,数量不断增长,影响力不断加强。

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公众越来越需要更多、更好的美术馆。自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观念成为公共意识形态的稳定组成部分,公众就日益渴望精神的、文化的、审美的满足,于是越来越多人走进美术馆,并积极地与这类文化机构进行对话和互动。在多

种多样的展览和活动累积起来的声望之下,公众对美术馆的希望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1793年,在大革命结束了君主制的法国,卢浮宫从皇帝的宫殿转而成为最早的公共博物馆之一。其中丰富的艺术品收藏使之具有浓厚的美术馆色彩。今天的卢浮宫仍然有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但事实上它的功能和社会角色始终在悄悄地进行调整,以适应公众越来越高的要求。衡量与评价美术馆的标准在发展中形成了与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相匹配的体系。我们对美术馆的看法早已和两百年前迥然不同。

前面的光明依稀可见,中国的每一个美术馆人都看得见这个行业的高速发展,都能感受到这个行业正在被接受、被重视、被瞩目。伴随着政策的支持和建设资金的涌入,大家都在畅想美术馆行业在中国的美好未来,无数个声音渐次响起,描述令人目眩的明天,向公众许愿更新奇、更国际化的场景。然而,在这一派蓬勃积极的气象之下,我们却必须更加理性,必须驱逐表面繁华,荡涤心头浮躁,美术馆人必须去思考——今天的中国、未来的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美术馆?中国的美术馆事业究竟应该如何建设、如何发展?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时,一连串相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中国的美术馆事业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美术馆事业走过了怎样的历程才到了今天这个阶段?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美术馆走过了同样的路吗?……我们可以罗列一个此类问题的清单。清单上的问题会越来越基本,也越来越要紧。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更是为了使建设中国美术馆事业的种种努力明明白白、有的放矢,让所有美术馆人在机遇面前更清楚该何去何从,我们应该也必须真正建立起一个学科:中国美术馆学。作为中国美术馆的馆长,我尤其深知这个学科的价值和意义,尤其能体会到从基础上建立这个学科的需要今天在多么紧急、多么迫切。中国有数以千计的美术馆,难道没有美术馆学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可以被认为是美术馆学研究的局部成果确实存在,而且近年来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但美术馆学这个学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真正从基础上建立起来。

自20世纪初,中国踏上现代化进程,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就开始对美术馆的功用、建筑设计、组织机构、藏品征集、保存与展览制度、教育职能、出版宣传等方面进行讨论。但是,即便把这些全都归纳到一起也还远远不能建构起“美术馆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讨论基本上还限于就事论事、倡导呼吁,或从实践操作层面做简单的归纳说明,大多片面而零散,并没有从学科的高度对美术馆进行研究。这些成果大多从与美术馆相关的一个具体问题开始讨论,关注的内容基本上集中在美术史论研究、艺术管理、美术教育等方面,极少有直接触及美术馆学本体的理论文章。这种情况让我们看到,整个20世纪,我们对美术馆建设方面的投入远高于美术馆学研究,中国的美术馆界在美术馆及美术馆学研究方面始终缺乏系统的、科学的认识。直到21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的美术馆学研究似乎才有些起色,出现了关于美术馆学的局部性著作,而一些刊物在美术

馆学研究方面也充当了前沿阵地。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系统的美术馆学研究领域有大片基础性的空白等待填补,但这实在是一件辛苦的工作。

任何学科都需要形而上的思考,需要理论指导,但任何学科都不能脱离其历史和现实而存在。美术馆学天生是一个交叉学科,从世界范围来看,它萌芽于博物馆学母体之内,却有着鲜明的学科个性。想要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范围内真正建立起这个学科,必须首先对这个范围内的美术馆的历史情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进而加以深刻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弄清中国的美术馆行业现存的不足有何根源、如何更好地发展,才能发现有哪些路径可供开展整个中国美术馆学建设,才能摸索出适合这个学科的种种研究方法、搭建起符合实际的研究框架。长久以来,中国的美术馆学领域一直在等待着有人投身于这些最艰辛的基础性工作,等待着有人把那些几乎要消失在岁月里的文献整理出来,归纳、分析,为我们勾勒出中国的美术馆行业整体的过往,包罗方方面面。

《美术馆的历史》便呈现出了这样一种最为谦虚、诚恳的努力。青年学者李万万投入了十几年时间,不仅从浩如烟海的文献里一点一点地捡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美术馆的珍贵信息,还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理清了美术馆发展的线索。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消化和处理了数以百万字的资料,运用它们开展了研究,把中国的美术馆缘何而起、制度怎样创建、诸般设想有否落实等问题一一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其中包含了极其严密的思考。从中西收藏传统谈起,将国际展览体制的推动作用纳入视野,把博物馆的酝酿之功呈现出来,对近代日本的文化影响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提出制度建设作为研究的主要线索,回到历史背景中去探究中国的美术馆发展等等——这些关键点恰到好处地连缀起了中国的美术馆从1840年到1949年的历史,没有太多冗余,也没有关键点的遗漏;呈现出真正的思考,又不会显得端起架子、不接地气。《美术馆的历史》配套的《中国近现代美术馆事业发展年表》给读者提供了最基本、第一手的资料,使整个研究形成了开放的格局,令这套书分量倍增。人人都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分享和向读者求教的态度,表现出了作者决心为美术馆学研究打基础、做贡献的最大诚意。

《美术馆的历史》提纲挈领地描摹出美术馆的发展脉络;从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现代形态的美术馆在中国出现及发展的关键外力与必然内因;深入地分析了美术展览体制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熟的内在规律;点出了美术馆这种客观的、历史的存在,对美术史等相关学科建构现代学术体制的独特贡献和巨大影响;还以全套第一手资料汇编了年表以辅助理解全书。关于美术馆历史的研究,是美术馆学研究的基础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术馆的历史》和由此生发出来的研究成果正是建立中国美术馆学的基石。